

主 编 张 磊 副主编 王 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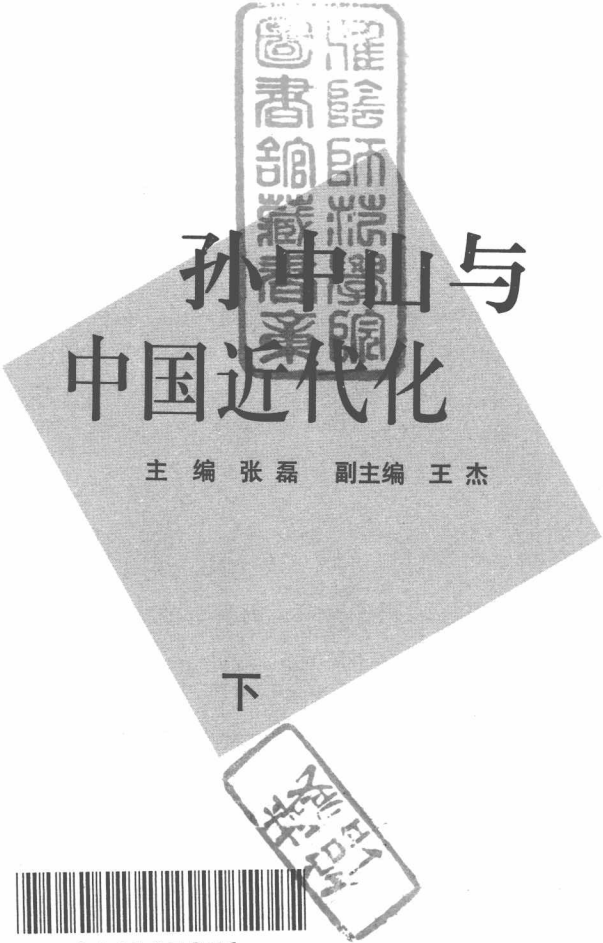


孙中山与 中国近代化

下

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418587



孙中山与 中国近代化

主 编 张 磊 副主编 王 杰

下



204185871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青 海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诸晓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主编张磊 副主编王杰

纪念孙中山诞辰 13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上、下册)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

ISBN 7-01-002829-X

I. 孙…

II. ①张…②王…

III. 孙中山-思想评论-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D693.O-53

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

纪念孙中山诞辰 13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上、下册)

SUN ZHONGSHAN YU ZHONGGUO JIN DAIHUA

主编张磊 副主编王杰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46.625 插页 1

字数:1123 千字 印数:1-1,000 册

ISBN 7-01-002829-X/Z·100

定价:70.00 元

目 录

下 册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上李鸿章书》	山口一郎(1)
人生观的革命从孙中山开始	方志钦(9)
试论初期孙中山的思想与行动	山田辰雄(21)
孙中山文化取向浅探	盛永华(35)
民主为体·以创立共和国为中心取向——论辛亥革命前	
孙中山的政治文化心路样态	王 杰(48)
孙文所受西学影响及其史观的形成	庄 政(76)
评孙中山与基督教	方式光(91)
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	孙占元(110)
孙中山和儒家“大同学”	汤志钧(123)
孙中山大同思想——“大同篇”之研究	郭展礼(132)
孙中山与五四新文化思潮——兼论孙中山	
对“新青年”的批评	吴雁南(146)
论孙中山晚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	
政治哲学的褒扬	姜义华(157)

孙中山的最后政治构想——民族自决、国民

- 会议、大亚洲主义 绪形康(183)
- 孙中山的自由平等观 罗耀九(193)
- 孙中山与人的近代化——关于塑造国民素质问题 刘兴华(204)
- 孙中山对近代道德的思考 黄明同(216)
- 孙中山伦理思想浅说 马小泉(227)
- 论孙中山“修明党德”思想 宝成关(240)
- 试论孙中山对国民心理的反省与重建 成晓军(251)
- 从“突驾”到“均等”——孙中山发展观散论
..... 汤可可 郑 焱(264)
- 论孙中山先生的舆论意识 阎小波(279)
- 孙中山与传播 吴沧海(292)
- 略论孙中山的统战思想 陈剑安(305)
- 孙中山的国防思想与黄埔建军 潘锡堂(320)
- 孙中山与梁启超对文化问题的思考 郭汉民(340)
- 孙中山梁启超社会主义观之比较 刘圣宜(354)
- 孙逸仙近代思想与郑观应、容闳、严复、胡适之比较 吴相湘(369)
- 世纪之交孙中山和严复的伦理思想近代化比较 苏中立(383)
- 孙中山与宋教仁民主宪政模式和实施方案的比较 迟云飞(394)
- 孙中山与朱执信中国经济近代化思想的比较研究 关 捷(407)
- 民前孙中山对海外洪门会党的争取和改造 任贵祥(423)
- 武昌起义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国内
关于孙中山活动的传闻 骆宝善(439)
- 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兼论
革命党人的财政困难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杨天石(449)
- 民初一项体现孙中山民族平等思想的法制变革
——《蒙古待遇条例》制定及实施 张小颐 齐 钧(462)

孙中山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赵立人(477)
孙中山与广州非常国会述论	丁旭光(486)
孙中山 1921—1922 年北伐的经费问题	
——试论孙陈决裂的经济因素	林能士(502)
孙中山广州蒙难与各方调停活动	梁尚贤(514)
孙中山与中山舰	萧致治(531)
有关“以俄为师”的一些问题	邱捷(542)
中国国民党与地域社会	
——以广东省的基层组织为例	深町英夫(556)
论孙中山致苏联遗书	马庆忠(567)
菲律宾革命与辛亥革命	章开沅(581)
日本决定对孙政策诸因素探析	俞辛焞(593)
孙中山外交政策给后人的启迪	
——“中德俄联盟”与“民族国际”浅析	李玉贞(609)
孙中山与近代法国	陈三井(625)
孙中山与上海韩国临时政府——关于申圭植的	
广州访问(1921 年 9 月—11 月)及护法政府对	
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问题	裴京汉(639)
孙中山与大同教在中国的传播	雷雨田 赵春晨(655)
试论基督教徒对孙文主义之研究	李志刚(661)
孙中山与蔡元培	蔡建国(677)
孙中山与林森	林伟功(694)
孙中山与葡人飞南第	陈树荣(708)
孙中山、飞南第与《镜海丛报》	邓丽兰(719)
孙中山与萱野长知	久保田文次(728)
论孙中山与后藤新平——以越飞会谈为中心	伊原泽周(738)
孙中山香港之行——近代香港英文报刊中的	

孙中山史料研究	莫世祥(752)
浅释港澳档案所藏有关孙中山与澳门关系	
研究的一些资料	霍启昌(770)
广东的孙中山研究概况	黄彦(783)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与《上李鸿章书》

山口一郎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他的早期论著《上李鸿章书》中已经表明了思想原型的基本内容。而且,孙中山不断将其基本思想予以深化,到了晚年,明确地展开了三民主义革命论的全貌。

(1)建立近代国民国家的构想

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1894.6)中提出了“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四大纲领,作为建立近代国民国家的基本方针。

第一条纲领,所谓“人能尽其才”,是以“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为目标,在全国普及学校教育,兴办学会以推进研究,起用各尽其能的人材,使其野无遗贤。第二条纲领,所谓“地能尽其利”是以“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耘有器”为目标,设置制定农业政策的政府机关,推进农学研究,致力于治水、灌溉、开垦,改良农具,提高生产。第三条纲领,所谓“物能尽其用”是以“穷理日精、机器日巧、增益减害”为目标,尊重科学,提高研究水平,推动机械化,开发电力,以发展轻、重工业及矿工业。第四条纲领,所谓“货能畅其

流”是以“关卡之无艰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为目标，减轻关税，保护商业，发展铁路、海运事业，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举此四大纲领而举国行之”，中国就能成为近代化的富强国家。这就是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要旨。

这四大纲领是根据孙中山在香港、夏威夷学到的“泰西各种学问”，以及所见所闻的“欧洲富强之本”而得出的结论。在中国面临着日益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危机的当时，不仅是孙中山，其他的忧国之士，都有过类似的主张。如孙中山曾私淑过的郑观应，也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中提出过与孙中山的见解相一致的四项改革方案^①。

而且，在清朝的大官僚中，也有像李鸿章等洋务派那样以采取“快艇、飞车、电邮、火械”之类“西人之新法”来推进洋务运动。这大概也是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的原因之一。

但是，孙中山在上书中，同时也指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批判洋务派的“从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孙中山不仅批判洋务派，而且已看出清朝政权无可救药，故在上书的四个月之后，便组织兴中会，掀起打倒清朝的革命运动。

在上书中，孙中山举出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举此四大纲而举国而行之”的“今日成效已有大可观”的例子。这“四大纲领”就是以明治维新为典范而提出来的。清朝末期，除了孙中山以外，当时革新派的许多忧国之士，都曾经把明治维新当做救国的先例。变法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把光绪帝当做明治大帝，并将维新后日本的近代化政策几乎全部吸收到戊戌变法之中。孙中山对明治维新的高度评价，直至他晚年，始终未变。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就任铁路总督办时，认为三民主义中，只剩下民生主义尚未着手。并规定民生主义为国家社会主义。为了实现

民生主义,虽然时间很短,但依然不惜为此而东奔西走。当时,孙中山还认为:必须向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学习。

如日本先时,亦不乐与外人交通,近数十年,因开放门户,遂成亚东强国^②。

孙中山认为日本之所以能成为东亚强国,是由于维新后的日本对外实行门户开放,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之下,推动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因此,孙中山又发表了在门户开放主义下的庞大的“物质建设(实业计划)”的构想。这个“物质建设(实业计划)”的构想是在由《上李鸿章书》中“四大纲”的基础上更详细、更具体地发展出来的。我认为,这个构想,对于今天、或将来中国的国家建设、经济建设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2) 批判“中体西用”论

如上所述,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对于洋务运动的“徒惟坚船炮利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予以批判。洋务派站在“中体西用”的立场上,想通过以军需产业为主的造船、矿产、轻工业的发展来推行清朝的改革。虽然如此,清朝却在西欧列强的侵略之下,一步一步地丧权失地,陷入殖民地的危机中。这就是孙中山所批判的“舍本求末”的结果。

面对亡国的危机,不仅是孙中山,其他忧国之士,如郑观应、薛福成、王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也对“中体西用”论予以批判,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革新论。这些批判都认为:正是由于洋务派把清朝的王朝支配体制作为“体”,以此来保持中国传统的“形而上之道”、“伦常、道德之道”。仅学习其作为“用”的西欧列强的富强之“术”、“形而下之器”,才使得中国濒临亡国的危机。

那末,如何革新这个“体”呢?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维新派,站在今天经学的立场上,在重新解释儒教的前提下,把作为“体”的

模范,求诸于明治维新,主张树立“君民共治”的立宪君主体制。孙中山通过自己的见闻,主张应该将“欧洲富强之本”、特别是美国的“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体制主义的模范直接作为“本”。与变法维新派不同,孙中山在上书后不到一年,就提出了“建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开展了以打倒清朝封建支配体制为目标的武装起义。

(3)孙中山的民本思想

孙中山在上书中,还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并以此为其革新的论据。

民本思想,不仅是儒家,就是道家、墨家等许多中国古代思想家都倡此说,是中国政治基底里的传统政治理念。在清末,不仅是孙中山,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许多革新家也都曾以民本思想为革新论的根据。清朝重臣李鸿章等也并不否认民本思想的传统,在洋务运动的实践中,也继承着这种思想。

但是,这个为“本”之“民”,是什么“民”呢?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理念中,洋务派与变法维新派、以及孙中山的革命派之间,是有差异的。孙中山将这个“民”主要地解释为呻吟在悲惨状况下的农民。为了拯救农民,他把振兴农业、刷新农政作为最紧要的使命。这一特色,与其他诸派,特别是洋务派有着根本的区别。

孙中山在上书以前,曾发表过论述西欧、中国振兴农业政策的小论文《农功》(1891年前后)。幼年时期,喜听反抗异民族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故事。以后,孙中山曾多次提到太平天国是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与洋务派、变法维新派不同的地方是,在上书不到一年,断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并不断发动打倒清朝的武装斗争。这也是同情农民悲惨境遇、倾倒太平天国革命的孙中山作为一位“革命家”的本来面目。

而且,在最初的武装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孙中山,以“国民革命”“平民革命”为目标,倡导三民主义,组织中国同盟会,领导革命起义。这时的“国民”、“平民”在孙中山的头脑里,我认为,主要是指极端贫困的广大农民阶层。

重视农民、振兴农业、改革农村的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在他流亡伦敦时,受到亨利·乔治等人的影响,提出了“平均地权”论。晚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终于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农民大联合”的主张。

(4)重视“人之心”“人之行”

孙中山在上书中提到,“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人”。任何事情的成功,都取决于人的“行”,也就是重视实践的思想,“人之心”如何驱使“人之行”的精神,或重视实践道德的思想,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教思想的基本特色之一^③。

在儒教中,最重视“人”或“人之心”、“人之行”的是孟子、王阳明。也许是这个原因,许多改革论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维新论者,谭嗣同、孙中山等革命论者都提倡“民为贵”,“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孟子的学说,以及提倡“人之心”中具有“理”、“良知”,使“知”与“行”的“合一”,通过“行”来完成“知”的阳明学,都将其作为变革的基本原理。《日本国志》(1879—87)的著者黄遵宪也把维新的成功归结于仁人志士的牺牲奋斗的“行”上面去。

当然,受到“西洋的冲击”,面对西方“近代”而苦恼的清末革新论者,并不仅仅向孟子、阳明学寻求变革的原理。正像幕末明治初年的日本一样,除了孟子、阳明学以外,汉学、朱子学、今文经学、“穷则变,变则通”的变革思想,以及墨子、老庄等思想,都被作为思想论据而提出来,在如何接受西方,把国家从危机的状态中挽救出来的问题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革新论。

其中有,如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其字面意义虽与日本佐久间象山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相同,但内容上却有差异。如变法维新派通过重新解释儒教而树立君主立宪制的维新论。如章炳麟那样佛学造诣高深的国学大师的革政论,当然,如孙中山以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为立足点的革命论等。

因此,在这些革新论中,对于孟子、阳明学的解释,其重要性以及所占的比重各有不同。洋务派是站在朱子学的立场上,以维护王朝支配,强化其合理性为目的的;变法派的康有为是从今文经学出发,通过对孔子的重新解释提出维新论的;龚自珍、谭嗣同等则倾向于阳明学左派的李卓吾、或者王船山,提出激进的改良论;而孙中山则以“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政治为其出发点,提出了革命论。

其中,孙中山最重视孟子、阳明学的思想。这可以从他在同盟会时期中,认为日本维新之功,在于维新志士们,醉心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而奔走的想法中推知之。

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学知行合一的学说,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此拯救 4500 万人于水火中之大功^④。

但是,孙中山在民国后,发表《心理建设》在申说其“知难行易”的学说时,重新检讨曾把明治维新的成功归功于阳明学说的错误。晚年,所得出的结论是:三民主义革命成功与否,取决于“民族主义的精神”。

(5) 结语

不管怎样说,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教的教义,曾使壮观的文化之花盛开起来,以儒教为国教的历史也走过漫长的道路。儒教对中国的政治、社会产生过巨大的规范力。汉代以后,虽然由于

王朝的更迭而有所曲折,再加上随着时代的变化,对孔子解释也有所不同,但儒教依然被继承了下来。山东曲阜的孔子庙,在异民族王朝统治时,反而比汉民族王朝更受保护,孔子庙像日本的伊势神宫那样,被神圣化了。我认为,可以将孔子的存在比作日本的伊势神宫、西方文明中的基督。

因此,进入 19 世纪时,对具有绝对优势的西欧“近代”的冲击,以孔子为象征的中国“传统”,不仅长期维持中华帝国的荣光,而且不得不从正面对西欧的“近代”作顽固地抵抗。特别是,执清朝政权之牛耳的西太后、满汉统治阶层,无论如何也要坚守中华帝国的荣光,及其中华思想,基本上视西方的“近代”为夷狄之文物。而且,如孙中山所说的“所诵习者不外乎四书五经及笺注之文字”^⑤的士大夫,将定型化、形骸化的朱子学奉为官学,他们的中华思想背后的支柱乃是这种朱子学。

在这一点上,同样重用朱子学者的德川幕府体制下的老中、幕臣、藩主等日本的统治阶层,很早就开始注视西方的“近代”,并积极地吸收其主要内容,到了幕府末朝,已经出现了主张民主主义议会政治的人物了。与此相比,清朝的统治者则显得顽迷固陋。我认为在中国,不能像日本那样,在时代大转换的时期中,巧妙地去容纳由下而上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根本改革的要求,使其转变成成为由上而下的“改良”,只能以武力打倒旧的支配体制,不得不走向由下而上的“革命”道路。

孙中山最早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清朝统治者实在是太顽迷固陋,必须发动从“下”而上的“革命”。而且,与日本不同的是,在具有“易姓革命”传统的中国,“革命”思想是历史上的必然之事,这种传统思想也被继承了下来。

但是,孙中山于 1895 年发动的最初的武装起义,很快地失败了。孙中山成为清朝政府悬赏的反叛者,流亡海外,以后在东京组

织中国同盟会,再三发动反清武装起义,直到1911年的武昌革命爆发,取得初步的胜利时为止。

(作者单位:日本关西大学)

注释:

- ①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提出了“教养得法,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
- ② 《在南京国民党及各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0页。
- ③ 以“人”的概念,与西方的“近代”相对比,或检讨中国、日本的“近代”时,必须进行详细分析,其意义是很重要的。在中国或日本的“人”的概念中,包含着与西方的“近代”的“个我”相通的“自”“己”“我”之类的主体性的“个我”的概念。但西方“近代”的“个我”,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是作为神的直接对照物而存在的。与此相比,中国、日本的“我”是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的。两者是有差异的。当然,西方的“个我”、“他人”也存在于社会之中,其“个我”是社会有机体说里的“个我”。而中国、日本的“我”是天人合一思想中的“我”。而且,我认为,在日本与中国的“人”的概念中,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不管怎样说,孙中山或日本的维新志士们,都从最重视“人”的“心”和“行”的孟子、阳明学里寻求革新的原理。这本身就说明,中国、日本在面临着“近代”巨大的历史转换期时,都在寻求各自向主体性的“近代”方向推进的自我变革道路。
- ④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8页。
- ⑤ 《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1页。

人生观的革命从孙中山开始

方志钦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人生的看法是多种多样的，多得不胜枚举。但就其目的而言，可概分为两类，一类是利己的，一类是利他的。利己的可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代表；利他的可以“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①为代表。就其态度而言，也可概分为两类，即消极的和积极的。消极的可以“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为代表；积极的可以“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为代表。对于一般对人生缺乏追求的人们来说，人生似乎没有目的，“日求两餐，夜求一宿”便可以存活下去；他们对人生的态度也无所谓积极与消极，“随遇而安”，“得过且过”便了。

有道之士向以“利他”为人生的圭臬，鄙薄“利己”者，珍惜生命，洁身自爱，以苟且偷生为大戒。古往今来，圣贤、豪杰、英烈之士，都具有这种传统。但是他们都脱不出封建纲常名教的樊篱。这种人生观虽属志行高远一类，终究还是旧意识——忠孝节义的产物。充其量，它只能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起调节某些人际关系的作用。至于自私自利，蝇营狗苟的人生观，因其为数不少，更是人群和社会的腐蚀剂，其作用之坏，自不待言。芸芸众生的无所作为、安于现状的人生态度，却不自觉地起到了保持和延续封建制度

的作用。

孙中山作为一个民主革命家，应首先自我完成（或实行）人生观的革命，也就是说，应首先给自我选择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身体力行，然后以之“唤起民众”，动员千百万人跟随他走上革命之路。他正是这样做的。因此，从孙中山开始的人生观的革命，对他和中国的革命事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孙中山的人生观革命，发端于他早年对中国固有的“利他”人生观的继承和对“利己”人生观的批判。

孙中山“早岁志窥远大”，已非常注意自己立身行道的问题，并以“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为做人的楷模^②。1890年（25岁），他在《致郑藻如书》中，第一句便说“窃维立身当推己以及人，行道贵由近而致远”^③，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当时的人生观是属于“推己及人”即“利他”一派。本着这种精神，他“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换句话说，他的“利他主义”的人生观已有10多年的历史。这是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过去学者研究《致郑藻如书》，多偏重其有关振兴农桑、立会（设局）戒烟、兴学育才的内容，而忽略了其开宗明义的第一句铿锵有力的人生哲理，这是很可惜的，该文中还有一句“某翘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可以作为“十有余年”之呼应。可见25岁的孙中山已是一个存心济世的志士。

4年后（1894年），孙中山又在《上李鸿章书》中再次申明他对人生的抉择：“且人之才志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于世之心，则虽处布衣而以天下为己任，此其人必能发奋为雄，卓异自立，无待乎勉勗也，所谓‘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犹[后]兴也’。”^④这种人就是他自己。该文又说：“顾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虽未能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时誉，然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盖有慨乎大局，蒿目时艰，而不敢以岩穴自居也”。“非欲待撰空言以渎清听，自附于干谒者